工业社会学小组研讨I结题报告

杨逢诜，王岳龙，李嘉龙，崔思博，罗昊云，符睿宇

经过约两个周的研讨和充分的意见交换、文件参考和质证过程，组内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本组对研讨课题“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何率先在英国发生而非在中国爆发”的一系列具象化的回答作出抽象的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这一工业革命过程的指导性意义，这些内容将在下文中作出简要陈述。我们在研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也会在下文中有所列举。

一、工业革命优先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的原因概述：

**（一）政治影响因素：**

在政治上，17世纪的英国业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新旧社会更替，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的议会逐渐接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且拥有了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条件；这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仅变更了政治权力格局，也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思想——“议会主权”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以及更加古老的“普通法宪制”，而后两者则是适于封建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的更新，使得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活跃的基本条件。

在议会掌控立法权的英国资产阶级，迅速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律，这些法律和决议案则从实质上大大刺激了英国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前夕对于提高生产力的基本需要。

而在古老的中国，古老的中华法系在17-18世纪虽然仍然在发生变动，但是其传统的、具有封建性质的内核却保持了基本的完整性；明帝国、清帝国的地主阶级专政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愈加强大起来，权力日益集中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少数地主官僚手中；资产阶级在这种社会中得不到充分发展，反而要受到地主的压制，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抑制，其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而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已经接近了它的生产效率极限，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并不存在。

**（二）经济影响因素：**

从劳动力角度讲，有可靠的文献报告称，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城镇人口激增，其中大部分是失去生产资料，无法进行自主生产的人。这些人不得不依附于剥削阶级参加劳动，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第一批廉价的劳动力，帮助资本家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而中国稳定的乡村宗族结构和城乡间的地理障碍则增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城镇经济结构则降低了人口流动的可能性；

从市场角度看，英国在18世纪及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不断地通过武力扩张海外殖民地，并且牢牢地把控住了殖民地的经济命脉，这无形中空前地扩大了英国资本家所面对的市场规模，庞大的市场刺激着他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同期的中国反而在实行消极的海禁政策和有限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无谓地耗费了社会资源，也遏制甚至缩小了中国国内生产者所面对的市场规模，中国的生产者对生产效率的追求似不及英国的同行那般热切；

从经济思想上看，英国在早期打破传统的农耕思想，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而后期则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原本指导经济建设，这种追求资本积累的思潮自然颇受资本家们的欢迎和支持。同期的新教改革，则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驱使着人们追求自我奋斗和职业正当化，这进一步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分工专门化。而对于同时期的清帝国，原有的儒家思想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在科举制度下逐渐地偏向保守和狭隘。它的主张压制了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这对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并无益处。

从经济组织形式上看，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行会制度在英国逐渐式微，传统的手工工场在逐渐向生产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制度过度，这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大。而在清帝国，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似乎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代中国停滞不前的铸币技术使得商业交易的效率降低，这对于市场和资本的充分运转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文化影响因素：**

一般地，我们指出：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历史记录，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英国人似乎更倾向于冒险、尝试新事物，愿意在可控范围内施行有利于自身的变革；对于变革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崇尚竞争，推崇“骑士精神”；正视乃至重视金钱和财富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技术变革；冒险精神使得他们愿意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采用新制度、新方法、新机器；对财富的重视则成为了资本增殖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而竞争又使得市场中各生产要素充分涌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而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儒家文化，包括一些佛道教的观点，仍然对人们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文化支持社会稳定、维护旧秩序，反对社会的激进变革，政治上趋向保守；片面地否定竞争，强调和谐和共存，提倡搞平衡和“中庸”；部分地否定了财富的意义。这些思想并不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搞技术革新，尤其是在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这种思想的负面影响甚大。同时，在封建社会末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出现和对于儒家经典的片面解读，则扩大了这种负面影响。

**（四）科学技术影响因素：**

我们指出：工业革命本身的演进过程具有这样的特征：新技术产生-新技术扩散-新技术的再进步。在讨论科学技术因素的时候，我们将着重论述以上三个节点在中英两国的存在性。

事实上，中英两国在“新技术产生”这一层面上并不存在着本质差异——而中国的某些新技术甚至能够领先同期的英国技术。两国的核心差异在于新技术扩散-新技术的再进步两个环节。而在两个环节中，受制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因素则逐步增加。对于英国而言，新技术本身的高效性使得生产者愿意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而专利法案则确保新技术的发明者在新技术扩散过程中有利可图；工厂制度的引入则扩大了技术扩散的规模。对于新技术的再进步，工业革命前期积累的资本和大工业生产经验，以及信贷和银行业的发展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充足的资源，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技师为之提供了足够的智力资源，专利法案保障了技术进步的创造者的经济利益。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技术进步三个节点能够形成闭环，并实现了技术飞跃。

而对于中国，虽然有一系列发明，但是在生产规模相对确定、不能够扩大再生产的情形下，虽然有熟练的工匠，但是并没有足以支持技术革新的资本力量，也没有保护这种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地理阻隔使得不同手工业生产主体之间联系甚少；况且我国在古代并不具有成体系的科学技术方法，也鲜见专门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才。在这一背景下，虽然技术进步在中国偶有出现，但并不足以演进为持续的技术革新。

**（五）国际环境因素：**

在18世纪乃至更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英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与英国相近的欧洲大陆上存在诸个综合国力与英国相仿的帝国或者王国。英国与这些大陆国家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英国不得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方面，革除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而推广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否则则难以在与欧陆诸国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和创新被迫成为主流，英国也自然的从这些改革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从17世纪开始，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诸个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发生战争，并且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些战争使得英国不断的扩张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同时也拥有了更大更广阔的市场以及原料生产地。这也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支持。

而对于处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稳定的内部阶级结构和安全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央政府对于自身的政治架构和经济结构体现出自满的倾向，而对于改革或者其他形式的革新，并不是十分的感兴趣，乃至对他们持一个完全的排斥态度。在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闭关锁国的国策的指导之下，清帝国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中央政府的官僚，都难以及时把握和了解世界上的最新动态。两个渠道的革新的阻断，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二、工业革命给出的启示及其指导意义：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亚当·斯密的主张下，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由传统的重商主义转向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政府逐渐地成为“无为的守夜人”。虽然亚当·斯密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仍然有效地促进了英国，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当代中国，完全沿袭亚当·斯密的主张并不合适，但是政府-市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乎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问题。在现阶段，市场仍在发挥重大作用时，经济部门在作出决策时以考虑政府-市场的平衡关系为宜。

（二）建立起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国内的市场逐渐合同，成为一个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这提高了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有利于市场的充分运作。而对于当今的国内市场，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并未彻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各地区自成体系的区域经济结构趋同、行业经营的所有制限制等问题仍然存在 ,并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中央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逐步干预，调节这些影响市场运作的因素，这样国民经济则能够得到一定的规范和改善。

（三）加快人才培养促进社会进步：

工业革命时期，人才的流动和教育的发展，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促成了英国的飞跃，也为普通人实现阶层跃升提供了渠道。当前局势下，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在这一背景下，重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在工程方面有所专长的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同样也要为人才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保护个人的经济利益：

人本身具有趋利性，保护个人的合法经济利益，有助于提高人本身的生产积极性，也有助于市场上诸经营主体的周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对于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工业革命的几个悬而未决的论题：

**（一）关于牛顿力学等基础科学对于工业革命的贡献问题：**

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革新的主导力量描述是“在一般生产经验指导下的，生产者的有意识改造创新”，同时指出基础科学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相对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较小；而目前的一种看法是，牛顿力学等基础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演进。对于两种观点，双方均找不到直接证据支持：前者的间接证据是诸新技术发明者的学历水平，而后者的间接证据则是这些基础学科日渐成熟的时间恰好与工业革命同期。我们不建议对此采取定论，这一争议的解决可能有赖于更多的历史材料的发掘。

**（二）关于圈地运动对劳动力的作用：**

一般地，学界认为圈地运动将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赶了出去，而这些农民不得不进城做工以维持生计；但是有文献指出圈地运动对于无产阶级劳动力的贡献并不显著，它指出圈地运动后同样规模的土地似需要更多劳动力，且英国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乡村劳动力自由劳动。该文献指出城市无产阶级的构成中除却破产农民以外还有部分外国移民和手工业者。针对这一文献的质证遇到了困难——这一文献中的部分数据我们无法查证。我们决定暂时搁置这一争议。

**（三）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机器制造业：**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献。但是根据我国古代的产业结构和协作模式推断，我们似能够得出一个较为不确切的猜测：“我国古代不具有成熟的机器制造业”。但是由于这一猜测不具有史料作为支撑，我们对此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四）关于大学对于工业革命的贡献：**

我们试图找到这一方面的材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的史料，反而有文献指出英国的某些大学对于工业革命不甚热心。目前关于大学与生产经营者之间合作的例证，我们仅仅找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瓦特之间的合作一例。